

这是迄今为止国内电视媒体最详实、最完整的
关于日军侵华期间性暴力受害者的纪录，她们
中的许多人都是第一次面对媒体。

一个个被损害、被蹂躏的灵魂，
带着无法解脱的痛苦，带着难以
言说的悲愤，悄然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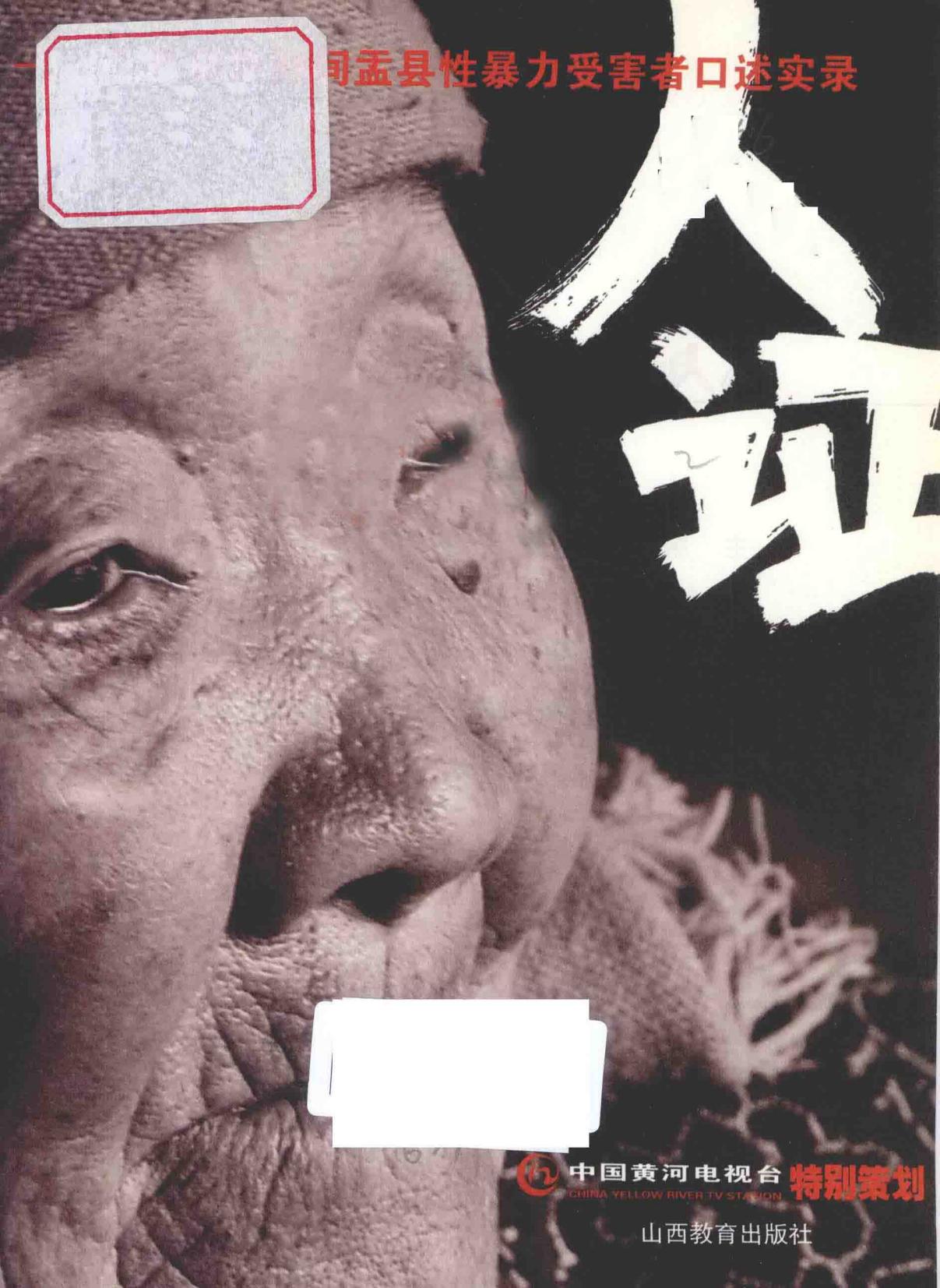
——日军侵华期间孟县性暴力受害者口述实录



中国黄河电视台
CHINA YELLOW RIVER TV STATION

特别策划

山西教育出版社



同孟县性暴力受害者口述实录

山西



中国黄河电视台

特别策划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人证：日军侵华期间孟县性暴力受害者口述实录/中国黄河电视台特别策划. —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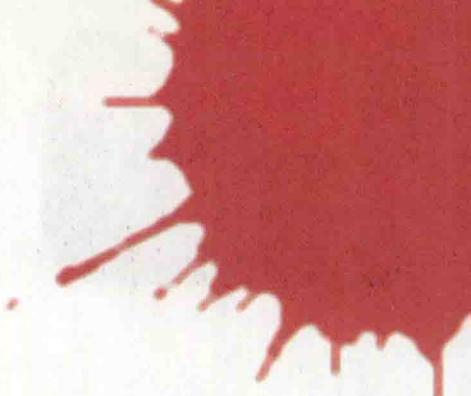
ISBN 7-5440-2996-4

I. 人… II. 中… III. 日本 - 侵华 - 史料 - 1937~1945 IV. G265. 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4499 号

人证：日军侵华期间孟县性暴力受害者口述实录

主 编 张敬民 罗庆东
副 主 编 宋献伟 郝江涛
编 委 张敬民 罗庆东 肖亚光 郭文君 宋献伟
郝江涛 郑李斌 葛丽娜 李 胜

责任编辑 邓吉忠
复 审 薛海斌
终 审 张金柱
装帧设计 陈永平 薛 菲
印装监制 贾永胜
出版发行 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水西门街庙前小区 8 号楼)
印 装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新华印刷分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440-2996-4/G·2710
定 价 24.00 元



《人证》图书编委会

主 编 张敬民 罗庆东

副主编 宋献伟 郝江涛

编 委 张敬民 罗庆东 肖亚光

郭文君 宋献伟 郝江涛

葛丽娜 郑李斌 李 胜

十五集大型口述历史纪录片
《人证》摄制组成员名单

总 策 划 梁志祥 牛辉林 李天太 张敬民
策 划 罗庆东 肖亚光 郭文君 宋献伟
总 编 导 郝江涛
总 撰 稿 郝江涛
编 导 郑李斌 李 胜 葛丽娜
摄 像 李 胜 郑李斌
编导助理 贾 敏 闫伟玮
摄像助理 杨 涛
解 说 郭 睿
创意包装 邢巨刚 耿辉旺
制作人员 马晓峰 王旭东 吴晓峰 马晓芳
王晋勇 郝晋军 郭俊平
活动宣传 柏少杰 葛晓琴 王 斌 胡 楠
陈 哲
制 片 人 郝江涛
技术监制 张 谦 孙长勇 梁 波
监 制 罗庆东 肖亚光 郭文君 宋献伟
总 监 制 梁志祥 张敬民

本书的缘起



人们常说“好了伤疤忘了痛”，但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有一种痛永远不可能忘记，有一个伤疤永远无法愈合！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场人类的劫难席卷世界，积贫积弱的中国自然无法幸免。在日本侵略者灭绝人性的入侵中，至少有3500万中国同胞在战火中丧生，鲜血和尸骸充溢着那一段悲壮惨烈的历史。

许多国家的历史学家和法律专家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两种罪行令人发指，那就是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集中大屠杀和日本法西斯实施的“慰安妇”制度。

二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四十万妇女被日军强逼为性奴隶，用身体抚慰侵略者兽性化的灵魂。受害者涉及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日本和少量在亚洲的白人妇女。作为这种国家机器暴力轮奸制度化的最大受害者，中国至少有二十万妇女被逼充当过“慰安妇”。

据统计，当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二十多个省市的占领区普遍设立了慰安所，其数目不少于一万个，中国“慰安妇”平均“慰安”日军工兵的比例是1：89。而在一些位置险要、交通偏远的山区，日军虽然没有设立正规的“慰安所”，但他们



强行把山区的良家妇女掳掠进据点，对她们进行惨无人道的性摧残。

山西孟县的性暴力受害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盂县位于山西省东北部，南距正太铁路上的重镇阳泉 45 公里，北临五台，西经阳曲达太原，东通河北平山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1938 年 1 月，日军独立混成第 4 旅团第 14 大队占领了孟县城。日军在孟县四周修筑炮台，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带来无穷的痛楚，更把许多中国女性拖入一个一生都无法摆脱的梦魇！

据专家估算，盂县受害女性至少达千人以上。她们当时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二三岁，年龄最大的也不过十七八岁，有的初为人母，有的刚作新娘，而更多的还是豆蔻年华的少女。其中大部分被日军凌辱致死，幸存下来的妇女，因为遭受了日军惨绝人寰的折磨，绝大多数丧失了生育能力，不少人在痛苦的煎熬中悄然离世。而现在还健在的，不仅在肉体上经受着病痛的折磨，而且还要在精神上承受世俗的偏见与歧视，她们的晚年生活大都孤独潦倒、凄惨悲凉。

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朝鲜、韩国、菲律宾、荷兰等国的受害女性相继站了出来，揭露日军的性暴力，并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经济损失。

1995 年，首例中国大陆日军侵华期间性暴力受害诉讼案在东京地方法院开庭。先后有十六位山西孟县籍女性站了出来，她们分别是刘面换、李秀梅、周喜香、





陈林桃、郭喜翠、侯巧莲、万爱花、赵润梅、赵存妮、高银娥、杨时珍、尹玉林、张先兔、杨喜荷、王改荷、南二朴。她们都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揭开伤疤不仅需要力气，更需要足够的勇气！

她们坚强地活着并勇敢地站了出来，成为中华民族那段苦难历史的见证者。

她们的勇气值得我们钦佩，她们的精神感动着世人。

时光流逝，这些生活在历史暮色中的老人所剩之日无多。从1982年开始，孟县被寻访到的性暴力受害女性有七十多位，而今健在的只有十五人。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抢救那段正渐渐被人遗忘的历史，告慰那一个个在屈辱中饮恨离开人世的魂灵！

在中国黄河电视台领导的精心策划下，《倾诉》栏目组行程近两万公里，历时半年，真实地记录了孟县二十位性暴力受害者的生存状态和口述实录，完成了国内电视媒体首部关于日军侵华期间性暴力受害者最完整、最详实的十五集大型历史纪录片《人证》的制作。

六十多年过去了，她们一直沉默着，沉默着……今天，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们终于向世人说出了埋藏在心中的屈辱和伤痛。

回顾那段惨痛的历史，我们应该再多些理性的思索。胜利来之不易，正是无数的牺牲使我们奋起，使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

岁月是最好的疗伤剂，但六十多年依然无法愈合受害者的伤口，她们还要痛多久？

长歌当哭，须在痛定之后！让我们勇敢地面对历史，铭记所有的苦痛！



目录

CONTENTS



本书的缘起 /1

序 言 /1

《人证》片头解说词 /13



第一集 万爱花 /14

中国大陆第一个站出来对日军的暴行进行控诉的受害女性



第二集 刘面换 /25

孟县健在的性暴力受害者中年龄最小的



第三集 郭喜翠 /36

日军的摧残使她连续疯了五年



第四集 李秀梅 /46

孟县被日军关押、摧残时间最长的受害妇女



第五集 张先兔 /55

只做了十五天新娘，她就被日军抓进据点



第六集 赵润梅 /62

当着亲人的面，日军将她轮奸



第七集 陈林桃 周喜香 /70

陈林桃：因为丈夫是八路军，她被日军抓住受尽了折磨

周喜香：因担任妇救会主任，被日军强暴了十五天



第八集 邢三妮 /80

首次向媒体讲述她六十多年前的痛苦经历



第九集 高银娥 /87

日军的兽行使她终生不能生育



第十集 张改香 李喜梅 /94

张改香：被日军强奸后，至今精神恍惚

李喜梅：遭受日军凌辱后，她被迫改嫁两次



第十一集 王改荷 /104

孟县健在的性暴力受害者中年龄最长者



第十二集 尹玉林 /114

被日军蹂躏两年后，她远离故土，背井离乡



第十三集 周变香 /121

日军侵华期间孟县最后个性暴力受害者



第十四集 侯冬娥 /129

第一个递交控诉材料，控诉日军暴行的中国大陆女性



第十五集 赵存妮 杨时珍 侯巧莲 南二朴 /136

她们都是当年日军侵华期间的性暴力受害者，她们都已先后离开了人世……

相关链接(一) ——见证悲怆 铁肩道义的力量 /149

责任——张双兵 /150



路程——李贵明 /158



正义——川口和子 /165



力量——石田米子 /173



使命——苏智良 /181



相关链接(二) ——情暖西烟 感悟历史的回眸 /190

摄制组感言 /200

后记(一) /208

后记(二) /209

序 言

历史不应遗弃这群老人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苏智良

“慰安妇”——性奴隶制度，是二战时期日本法西斯犯下的反人道的战争罪行。由于在东方，性侵害受害者多难以启齿，再加上加害方的刻意隐瞒，因此，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内幕直到最近几年才被公布于众；尽管如此，来自中国受害者方面的揭露还非常少，而本书提供了来自山西孟县受害者的珍贵个案。

一、日军为什么要建立“慰安妇”——性奴隶制度？

日本政府和军队为什么要实施“慰安妇”制度？其主观动机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向官兵提供性服务，以稳定军队、安定军心，并提高官兵士气，增强战斗力。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投入战场的官兵多不明白战争的性质和意义，日军高层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而且由于日军的法西斯性质，内部实行绝对的家长制度，上下级关系只有服从，没有温情，新兵时常遭到老兵的殴打，长官更是以差遣、欺压士兵为能事。这种封建的官兵关系使士兵们感情压抑，加上战争的残酷，使之逐渐对军队生活产生厌恶、仇恨心理。这种人性压抑

一久，便导致无序发泄，造成了强奸案的大量发生，以及士兵反抗长官事件的增加等。于是，日军上层企图通过推行“慰安妇”制度，把“慰安妇”作为士兵发泄的对象，“慰安妇”成为士兵的“镇静剂”。1939年6月，日军独立炮兵第3联队的《阵中日记》记载道：“现在，慰安妇增加了，精神上感到很是安慰。”^[1]

日军的侵华战争一开始就陷入了泥潭之中，是一场没有归期的战争。官兵没有任何休假，看不到胜利，这些都导致官兵情绪低下，而且，日军的生活设施也较为简单，毫无乐趣和享受可言。长期的禁欲生活使军人积蓄了太多的性能量。为此，日本军方企图通过提供女性来刺激士兵的士气，以使其更加卖命。日军前线的军官曾反复指出，为了鼓舞士气，必须要解决性问题。这一点在士兵的记录中也得到了证实。老兵曾根一夫说：“无论是老爷般的老兵，还是童颜般的少年兵，都一致渴望早一点接触到女体的猴急模样，实在是滑稽透顶。”水野靖夫则指出：“上级号召士兵们首先要去‘养精蓄锐’。没有接触过女人的人，就打不了仗。所谓的‘养精蓄锐’，就是要去体验女人。我们登陆后，便结队成群地走向‘慰安所’……为了满足性的欲望，不，为了培养一支像样的杀人部队，使之玩弄一下敌国的女人，那简直算不了什么。”^[2]1940年，陆军省医务局长三木良英在视察了东北的日军部队后写道：“第一线部队的生活，一般都不佳，当考虑精神慰安、给养问题。据部队长所说，原因不明的逃亡、犯罪接连发生，士兵们精神低落。”于是，“土肥原师团长要求派遣慰安团。据说国境守备队三年间完全没有外出，应该督促爱兵恤士”。^[2]从这段话中可以想见日军的苦恼和实施“慰安妇”制度的初衷。当中国远征军攻击松山（日军称拉孟）战斗到了白热化的时刻，日本军官还驱赶着“慰安妇”们到战壕中对士兵们“慰安”，以此激励穷途末路的士兵的战斗热情。因此，日军的后方司令部常常把日本“慰安妇”叫做“大和SEX特攻队”。

在残酷的战争中，士兵不知何时就会突然死去，他们普遍带有强烈的恐惧心理。在这种恐惧心理的驱使下，他们在战场上会干出种种越轨暴行。日军高层认为，让士兵们依偎在女人的胸脯上，与女人亲近，有利于摆脱这种恐惧，所以设立“慰安所”能暂时缓解士兵的恐惧心理。东史郎在其日记中记录士兵的这种心态：“有人说：‘如果在下次的战斗中死去，现在钱放着还有什么用呢？还是尽情地享乐吧！’这样一说，引发了更加狂乱的热潮。大家沉浸在无以言状的狂欢之中，充分地享受着

肉体的愉悦。”^③千田夏光在《从军慰安妇·庆子》一书中这样描写道：庆子深夜被猛烈的敲门声所惊醒，一队从前线归来的士兵冲入了“慰安所”，第一个带着火药味的士兵把庆子推倒在床上，迅速撕开庆子的上衣，然后发狂地用嘴吮吸着庆子的乳房，一边还呻吟道：“我得救了，得救了，不会死了！”第二个士兵竟反复亲吻庆子那作为‘慰安妇’被无数士兵玷污过的地方，嘴里反复念叨：“孩子他娘，孩子他娘！”所以，对于士兵们来说，拥抱“慰安妇”可以证明“今天我还活着”，并祈祷“明天我还能够活下去”。

第二，为了维护日军的所谓“军纪”，把大规模的光天化日下的强奸事件变为“慰安所”式的强奸制度。

自发动侵华战争后，日军所到之处，最骇人听闻的就是大肆强奸当地妇女。其登峰造极之作便是在南京留下了强奸两万起的残暴记录。1938年6月27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冈部直三郎不得不承认，在华日军中发生了大量的掠夺、强奸和放火等不法行为，尽管军方已加强管束，但这类事件仍然频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减少强奸事件，只有推行“随军”“慰安妇”制度，以图恢复占领地的秩序。也就是牺牲部分占领地女性而维持日军的纪律，以“慰安所”来承担释放日军士兵性能量的作用。陆军军医中尉、金泽医科大学教授早尾雄在对侵华日军调查后指出：日军官兵因无法压制性欲而对中国妇女施暴，因此，宜尽快开设更多的“慰安所”，其主要目的在于预防强奸案的大量发生而使皇军的威严下降，并影响占领地的治安。所以，后来日军在准备侵入武汉时，为了防止出现像占领南京时出现的混乱状况，在部队中普遍设立了“慰安所”。日第2军进入武汉后，只允许在军官的带领下前往“慰安所”。同样的例子，当第116师团要进入湖南宝庆时，后方主任将宪兵队长山田定招来问道：“司令部最担心惹起强奸的事件。宪兵队长，为预防这种事故，能不能去募集些‘慰安妇’来？”于是，山田纠集当地汉奸，抢来一批中国妇女，设立了“慰安所”。1938年底，日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曾得意地说：“现在的兵团，几乎都有‘慰安妇’团随行，似乎成为兵站的一个分队。像第6师团那样，有‘慰安妇’团随行，强奸案就绝迹了。”战后担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1942年任海军第二设营班主队长、主计中尉，他曾负责建立“慰安所”，并且对能完成这一任务而颇感自豪。后来他回忆说：“第二设营班是有三千人的大部队，总是发生袭击当地妇女的事情。我颇

费苦心,为他们设置了‘慰安所’。”在军队中普遍地设立“慰安所”,尽管使强奸事件有所减少(当然没有禁绝强奸案的发生),然而这实际上是以整体的、有组织的国家犯罪来替代军人的个人犯罪。

第三,预防性病的流传。

日军企图通过设置“慰安所”,并对“慰安妇”进行严格的体检,来杜绝官兵中蔓延的性病。即使是在日军中,性病也是不光彩的疾病。军方规定战伤为一等疾病,内科疾病为二等,性病是最低的三等疾病,^[4]而且,患了性病就很难被提升重用。在日本战史中,最惨痛的一次关于性病的记录是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的战争,性病患者的人数竟比战死的人数还多。究其原因,就是日军军纪涣散,肆意强奸当地妇女。由于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巨大的伤害力,性病会严重损害军队的战斗力,甚至会影响子孙后代,危及国民整体的健康。1939年6月,日本军医早尾雄曾指出:日军由于利用民间的妓院(实际上主要原因是对战地妇女的强奸——笔者)而引起性病的流行,从而导致战斗力的下降。日军既然不能制止士兵嫖妓,只能通过“慰安所”满足其性要求,并对“慰安妇”实行严格的体检,不合格者不准接待士兵。同类资料还有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军医部在1940年2月颁布的《对干部的卫生教育顺序》中也承认花柳病对日军战斗力的影响。同时,日军还通过使用避孕套、星秘膏等手段来预防性病。但是,由于官兵的胡作非为,加之日军对军人的检查极为松散,日军官兵中患性病的仍然为数不少。

第四,治安与防谍。

如何解决官兵的性问题,的确是日军面临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允许官兵自由地到占领地的民间妓院去,那将会导致危险甚至丧失生命。日军高层又担心,日军在中国各地作战,与当地民众接触,尤其是与当地娼妓接触,容易暴露日军兵力、作战动向等机密,中国的妓女有可能将日军的情报转送给中国军队。因此,为了防止日军官兵的自由活动,可以设立军队控制的“慰安所”,让妇女“从军”来为官兵提供性服务。有个老兵曾道出心里话:“日本‘慰安妇’可以放心,朝鲜‘慰安妇’也可以放心,她们即便天天和士兵在一起,也不会向敌方泄露情报。之所以不征集中国女性做‘慰安妇’,就是为了防谍。”^[5]实际上,由于日本、朝鲜“慰安妇”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日军的需要,于是,日军便大量征集中国女子为“慰安妇”,并控制其人身自由,

防止被中国抗日部队所利用。在许多“慰安所”内，日军规定禁止使用日本语以外的语言，这样既是防止情报外泄、提防逃跑的策略，同时又是日本侵略者对殖民地人民强制实行日语教育的一种手段。

第五，对中国妇女的发泄，对日军官兵具有特别的意义。

最初，日军士兵对中国妇女强奸案迭出，据说是因害怕中国妇女反抗，他们不太愿意在“慰安所”内接触中国妇女。但是在战争进入第二战略阶段后则有明显变化，日军大规模使用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据说这样能够抚慰那些因长期战争遭受挫折而产生沮丧情绪的日军官兵。他们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袭扰、打击而出现的低落情绪，在中国“慰安妇”身上得到了最有效的校正。日军情报部的官员在给陆军本部的文件中指出：“这种心理作用，惟有中国‘慰安妇’能让日军的士兵产生；她们能鼓舞士兵的精神，能够在中国尽快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当武士道不能支撑精神崩溃的士兵时，中国‘慰安妇’的肉体却能对复原士兵必胜的信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能在中国女人身上得到满足，必将在中国领土上得到满足。占有中国女人，便能滋长占有中国的雄心。”因此，他建议军方必须秘密征用更多的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从精神到肉体安慰日本军人，树立他们必胜的信心。^[6]这样，日军便有计划地大量征用中国妇女充当性奴隶。将白天对中国军队的失败化为晚上对中国妇女的征服与胜利，这成为前线官兵最热衷的话题。而且，日军对抗日女性的性侵害占有一定的比例。在孟县的受害者中，万爱花、周喜香是女共产党员、村妇救会主任，王改荷是村妇救会主任（其丈夫是共产党员），外号“盖山西”的俊媳妇侯冬娥也是村妇救会主任，陈林桃则是八路军家属。中国“慰安妇”便成为日本军方首脑反复强调的“对于鼓舞将士的士气，完成圣战，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武器”^[7]。

这样，女人便成为日本法西斯分子手中的重要的战争资源，而孟县妇女就是在战争第二阶段被集体掳掠为性奴隶的。

二、日军是怎样在孟县建立性奴隶制度的？

为了对抗日军的进攻，八路军第115师于1937年9月挺进晋东北地区，随即以五台山为中心，开创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孟县属于该边区的北岳区，也建立了